



DHSF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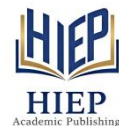
Journal of Digital Humanities and Science Fiction Studies

DHSFS, Vol. 1, No. 1, 2026, pp. 105-115.

Print ISSN: 3105-1278; Online ISSN: 3105-1286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dhsfs.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DHSFS.26.1.09>



论《发条女孩》中人类与后人类建构对话关系的可能性

张 媛 (Zhang Yuan)

摘要: 《发条女孩》是美国作家保罗·巴奇加卢皮于2009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其中，后人类形象惠美子的边缘身份联系着底层群体、女性、外来难民和人造物种的命运。因此，人类和后人类通过创设共同的议题，建立了对话关系的可能性基础，并促进了“多声部”主体间认知模式的转向。围绕“重构边缘女性的身份”“反思‘完美人类’的有限性”“重新定位人造物种”这三个共同的议题，人类和后人类以不同的视角表达了对自主独立、平等权利、人文关怀、家园归属的渴望，小说形成了跨越人物既定身份边界的复调叙事特色。

关键词: 后人类形象；后人类主义；对话；《发条女孩》

作者介绍: 张媛，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科幻文学与美国本土裔文学研究。电邮：zhangyuanaviva@163.com。

Title: On the Possibility of Constructing a Dialogic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Posthumans in *The Windup Girl*

Abstract: *The Windup Girl* is the debut novel by American writer Paolo Bacigalupi, first published in 2009. In the novel, the marginalized identity of the posthuman character Emiko is linked to the fates of the lower class, women, foreign refugees, and GMOs. Therefore, by creating common themes, human and posthuman establish the groundwork for dialogue and facilitate a shift towards a cognitive model of “polyphony”. Centered around the three common issues—“reconstructing the identity of marginalized women”, “reflecting on the

Received: 13 Jan 2026 / Revised: 08 Mar 2026 / Accepted: 10 Apr 2026 / Published online: 30 Apr 2026 / Print published: 30 May 2026.

limitations of the ‘perfect human,’” and “repositioning artificial species”—human and posthuman express their longing for autonomy and independence, equal rights, humanistic care, and a sense of belonging to their homeland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s a result, the novel develops a polyphonic narrative characteristic that transcends the boundaries of the characters’ established identities.

Keywords: posthuman character; posthumanism; dialogism; *The Windup Girl*

Author Biography: Zhang Yuan, Ph.D. candidate at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Fudan University. Research Areas: Science Fiction and Native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zhangyuanaviva@163.com.

引言

《发条女孩》（*The Windup Girl*）是保罗·巴奇加卢皮（Paolo Bacigalupi）于2009年发表的长篇处女作，小说将背景设定在23世纪的近未来，描述了日本科技公司为缓解国内劳动力不足，因此通过基因编辑技术创造出了后人类形象——新人类（New People）。其中，主人公惠美子（Emiko）是这些后人类中最具代表性的形象，它不仅象征人类、人造物种和后人类的混杂主体性，它与人类的关系也构建了小说的后人类语境。这种后人类主义的探索解构了传统的“人类”概念，同时继承了人文主义对现实的关怀，想象了后人类在当代社会中的存在方式。小说通过描述人类与后人类之间多样化的交往关系，展现了从主客体关系到主体间对话关系的发展过程，反映了在技术发展语境下，人类对自我和他者认知的转变。《发条女孩》重新审视了人类、技术、他者之间的关系，为我们提供了人类与后人类达成主体间对话关系的可能性与新视角，启发我们重新思考文学和人文观念。

纵观《发条女孩》，巴奇加卢皮以后人类形象引导读者思考自身的物种、种族、性别、阶层身份，构想了人类与科技、文化、各种意识形态话语相互交往的多种可能性。起初，人类与技术的相互作用催生了后人类生命形式，后人类生命形式对人类的主体性可能会形成威胁，因此人类试图以单向操控的方式来掩饰自身的主体性焦虑，由此形成了人类和后人类之间的关系困境。人类和后人类的关系困境表征为后人类的工具性身份：从物种、阶层和性别维度，后人类被人类物化为私有财产、奴隶、性客体；从物种和阶层维度，科学家精英依据生物进化论和超人类主义，强化了“完美人类”优于其他物种的统治逻辑；从物种和性别维度，环保主义者以“纯净”自然的信条和暴力手段试图将后人类、人造物种驱逐出生态圈。

接着，本文认为人类和后人类之间的关系困境很大程度上在于一种“独白”的认知模式：“独白原则最大限度地否认在自身之外还存在着他人的平等的、以及平等的且有回应的意识，还存在着一个平等的我（或你）。”（巴赫金，1998，p. 386）“独白”的认知模式一方面在于人类不赋予后人类同等的主体地位。后人类遵从人类的意志，进而认同自身主体性的匮乏。另一方面，后人类统治人类的预想是“独白”认知的另一副面孔。“独白”的病征体现在，其一，人类与后人类对彼此的认知是僵化的；其二，人类倾向于将差异作为分歧、隔离、等级的缘由，排斥共识的建立。然而，后人类的存在已然融入到其他人物的行动中，它们成为参与叙事的主人公、成为小说情节的有机组成部分。后人类身份的混杂性和边缘性特征联系着故事中的底层群体、女性、外来难民、人造物种的命运。由此，人类与后人类得以通过创设共同的议题来建立对话的可能性基础，促成“多声部”主体间认知模式的

转向。

从“多声部”认知模式出发，根据“边缘女性身份”“主体的有限性反思”“人造物种柴郡猫”这三个共同议题，后人类与其他人物生发了多个层面的体验与看法。本文阐释了这些看法之间或冲突、或交汇、或相互影响的轨迹和意义。不同人物及其看法形成了“多声部”，它昭示出后人类视域中人物的成长与身份的变化，人类可能超越极端优越论，在复杂、流动的关系网络中重新认识自身和世界。

一、“多声部”主体间认知模式的转向

人类和后人类之间“独白”的认知模式可能会导向人类对后人类、人造物种的压制与操控，主客体对立的逻辑也可能建立起人类与后人类的等级关系。在后人类主义的视域中，人工生命形式引发人类对自身本质的思考，它们成为与人类共在环境的一部分；同时，它们也可能成为与人类面对共同体危机，共同参与社会革新、生态网络循环、文明建构的行动者之一。因此，后人类的主体性声音不可能被永久地埋没。小说中，在等级森严、多元生命混杂、危难频发的曼谷社会，人类和后人类如何开启主体间的对话关系呢？本文认为，人类可能需要调整对后人类、人造物种的看法，以流动、生成性的眼光看待人类与他者的主体身份。同时，人类也可能需要将差异性视为多样性的源头，从而把握差异的形成过程。理解和尊重是人类和后人类寻求共识的前提，差异性并非难以跨越的沟壑。这一认知具体表现在，人类和后人类面对共同的生存处境和现实困境，二者能够自由地言说对同一议题的不同感受，这些感受从而谱写成互不压制、互相补充、众生喧哗、融洽和谐的“多声部”乐章，在复调式的对话中，人类和后人类有望实现主体间的对话关系。

“多声部”的认知模式首先表现在，人类能够转变对后人类的固有看法，一定程度上克制部分的优越论和权力欲，颠覆既有的标准和概念框架，将后人类动态地解读为具有生命活力的主体。后人类以一种技术产品的形式走进人类的认知领域，此时，人类可能以一种传统的观念和标准来评估后人类，“人的标准代表了正态、常态和规范性，它通过将作为人的具体模式转化为一个一般化的标准来发挥作用，这样就获取了作为人的超验价值：从男人到男性再到作为人性普遍化范式的人自身”（布拉伊多蒂，2015，p. 3）。然而，后人类并非严格意义上绝对被动的产品，它们的类人体征、超凡的工作能力、高级的智识、敏锐的情绪感受力都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了人类对“动物”、“物种”及“物性”、“人性”的既有理解。

变量既带来人类对自身本质的忧患，也可能引发人类对人文主义的反思。“后人类”是被“具身化、性恋、情感性、通感以及欲望——这些核心品质所界定”（布拉伊多蒂，2015，p. 3）的生命形式。对于人类眼中的后人类，人类主要经过了从产品-服务机器-人工生命-后人类的认知过程；同时，人类自我认知向内经过了普遍化范式的人性、扩张的“自我”-生产、操控机器的人类-统治人工生命的人类-和后人类共处的、作为万物之一的、小写的人类。人类和后人类都在相互认知中移动各自的主体性位置，即便在一开始人类也许并不承认自身“被后人类认知”的阶段，二者都无法被先前指定的位置所捆绑，都在动态适应的过程中达成一个新的历史建构。“在某种程度上，只有当技术改变了典型的人类主体思维过程或经验的情况下，我们才可以开始窥见后人类主义身份的可能性”（姚富瑞，2022，p. 12），后人类主义的立场趋向于形成主体身份的流动性，它体现了人类和后人类双方、双向、非线性的认知特性。因而，即使作品中的人物没有将后人类主义提升为表层的主流观念，甚至抵触人文主义传统的更新，也不可完全否认后人类在社会中已然转化为主体存在的事实及各种效应。

在小说的曼谷时空中，后人类和人类构筑了一个差异性共存的世界，而差异性能够作为消解统治逻辑的工具之一。“女性主义要求男性认可‘他者’，不但要承认其特殊性，还必须认可其平等的本体论地位。这种本体论将表明我们有必要将自我/他者（self/other）的差异看作一种基于分层结构制度（heterarchy）而不是等级制度（hierarchy）的相对差异性”（戈德、墨菲，2013，p. 7），“他者”表征着“自我”的差异性存在，它是构成自然与文化多样性的基础。“分层结构制度”意味着“自我”与“他者”分布在生态系统（包括社会系统）的不同环节，分担各个环节中的不同任务，扮演的角色各异。这些差异性开启了系统内外的和谐运作与创造性的活动，复数的“自我”和复数的“他者”也因差异性构建了丰富的、相互纠缠的关系世界。因此，“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差异不应沦为等级压迫制度存在的必要充分条件。

科技因素贯穿了自然、社会、文化领域，因此后人类形象可能成为生物技术贯穿这三个领域的具象表达方式。《发条女孩》的文本世界展现为：其一：自然领域，包括人类、社会、人造物种（后人类、动物植物、微生物）、基因瘟疫；其二：社会领域，包括自然、科技、人类、种族、性恋、阶层、人类的劳动产品（后人类）；其三：精神文化领域，包括人类、自然、科技、创伤记忆、宗教信仰、人文主义（后人类主义）。后人类形象成为这三维领域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也成为联络三者的重要纽带。后人类可以在各个领域内部和领域的边界上沉潜其中又出乎其外，表达自身的感受，或质疑约定俗成的规范，或与边缘群体缔结无形而有力的同盟关系，或以抵抗的姿态激发出人工生命的潜力。

人工生命在文学作品中揭示了自身混杂的主体形象，同时，它们呼应了边缘的人类群体、人造物种的生存状态，并以对话关系和差异性重新解码世界的真相。在帕特里克·墨菲（Patrick D. Murphy）看来，“既然巴赫金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成功地将人类‘他者’转化为‘说话主体’，我们可以将这种说话‘他者’的想法延伸到像动物这样的非人类实体，同时也将它们的‘语言’视作一种值得肯定与聆听的语言形式。”（多诺万，2013，p. 113）因此，恢复非人类、后人类角色的“说话者”身份至关重要，“艺术作品尽管是一种以具体形式存在的客体，但它在与观看者相遇时恢复生机，成为一种主体”（同上，p. 111），后人类“说话者”也正是在科幻中与读者、世界相遇，成为“对话者”主体。哈拉维（Donna Haraway）认为，“赛博格是一种控制生物体，一种机器和生物体的混合，一种社会现实的生物，也是一种科幻小说的人物”（2012，p. 314），后人类形象交织着机器、女性、动物、生物技术的因素，它们凭借“他者”的身体和身份来反映社会现实，也促使读者想象——被视为工具的“赛博格”如何将统治逻辑作为自己生存的“工具”。“这些工具往往是故事、复述的故事，颠倒和替换自然身份等级二元论的版本”（同上，p. 33），被视为工具的后人类巧妙地使用差异性，从而试着破坏强权下的政治机构、意识形态、生产模式、欲望结构。人类和后人类拥有这种“破坏”潜能，这种潜能体现在二者对强权下女性身份的重构。

二、人类与后人类对边缘女性身份的重构

坎雅和惠美子打破被规定的边缘女性身份，实现了不同身份的转换。不同身份之间是相互兼容的关系，不同身份代表了不同的话语和权利，也象征着不被物化、恢复生命尊严的个性。在经历了一些事件之后，二者既有的灵魂认知发生了转变，转变的灵魂观又影响了其自主性，自主性是她们重构边缘女性身份、共同探寻生命尊严的动力。

作为环境部的卧底，坎雅在报恩和报仇、义务和道德的矛盾间游走，社会的使命和个人的恩怨将

她撕裂，“斋迪的鬼魂”意象对坎雅认知和塑造自我身份具有重要意义。其一，它让坎雅产生背叛后的愧疚感，它是坎雅内心争斗声音的外化表现形式。其二，“斋迪的鬼魂”疏导了坎雅的混乱意识，促使坎雅以自己的方式帮助更多的灵魂。不同于游荡在曼谷街头的大部分鬼魂，斋迪仍以鬼魂的存在方式帮助、引导坎雅继续完成未竟的事业。其三，“斋迪的鬼魂”影响了坎雅的死亡观，它使坎雅认识到个体的死亡和来生都不是终点。无法转生的鬼魂意象质疑并且反拨了人类的因果轮回观念，最终消解了坎雅对转生的恐惧，促使她展开新的行动，激励她对现世人生负责。

鬼魂意象也是人物灵魂观的一种缩影，它传达出现世的残酷和人们未来理想之间的矛盾，同时作为一种潜在的统治观念，“灵魂”表征了人类对后人类生命形式的偏见。然而，在坎雅和后人类的交往过程中，这种偏见得以被轻微地矫正。日本商人吉本的后人类秘书弘子跟随坎雅一同返回环境部，并提供证据。她对弘子说道：“你们都是非自然的，都是在实验室的试管里培育出来的。你们全都违背了生态的规则，全都没有灵魂，没有因果。”（巴奇加卢皮，2012，p. 433）但是，当她们在大楼中并肩抵御贸易部的枪炮时，弘子冒着生命的危险保护坎雅，无论坎雅是否明确地表达感谢，弘子的善意已经让坎雅感到动容，并让她稍微修正了既有的刻板印象。

那么，后人类是否有灵魂呢？在人类中心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立场中，灵魂是人类建构的一种身心二元论话语，“在16和17世纪，笛卡尔和其他科学家、哲学家致力于将被视为像自然界的其他事物那样机械地运作的人体从独立自主的人类心灵中分离出来，这是在理解自然方面极为重要的发展”（莫兰，2023，p. 190），人类将后人类群体视为机械运作的非自然物体，已然将之排除在人类和自然的范畴之外，更不愿意赋予后人类“心灵”的维度。显然，后人类拥有自身表达心灵的方式，这种方式在于它们对生命的同情和对尊严的维护。在坎雅看来，任意动用武器的贸易部更像一群失去理智的作恶者，“我们没有受过应付这种事的训练。我们的工作是在抵御锈病和流感，不是对抗坦克和巨象。”（巴奇加卢皮，2012，p. 41）这种训练是社会制度的规训，它要求生命在一个模式化的机构中形成惯性和惰性，从而使它失去感知机构之外世界的的能力。当突发情况出现，生命便会被束缚在偏见的牢笼中，失去行动的活力与转变身份的自主性。同理，传统的灵魂观是社会制度对精神和行为的控制手段，它虽然维持了人类本体的稳定性，却剥离了主体的差异性和多样性，限制着人类与后人类的自我认知及采取行动的能力。

“猎鹰”意象生动地描摹了惠美子渴求独立与自由的心路历程。通过摆脱灵魂观对自主性的束缚，坎雅和惠美子都逐渐实现了身份的重构，在体验濒死之后，惠美子才形成对“生”的体悟。不同于坎雅被环境和个人情感限制的身份，惠美子的身份牢笼是由“基因决定论”、后人类教育理念、后人类的灵魂观念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成为惠美子重构身份的巨大心理障碍。敌意和暴力让它改变了对人类的仰视姿态，这些“冒险”成为它挖掘自身潜力的契机。惠美子渴望成为自由的“猎鹰”，但是残酷的现实增加了实践阻力。惠美子回到酒吧，再次遭受同类坎妮卡一整夜的凌辱，“身体里的那只猎鹰——如果真的有过的话——已经死去了。它无法飞翔，无法逃亡，除了屈服什么都做不了。”（巴奇加卢皮，2012，p. 368）惠美子在屈辱中怀疑猎鹰之梦的可行性，即使它被优化过，服从的基因依然控制着它，它不得不接受自身的命定性，并承认自己的无助。在被颂德等王室成员侮辱之后，惠美子在绝望中生发出不可遏制的愤怒。它不愿向基因决定论低头，再一次向罗利提出前往“新人类村庄”的要求，却再一次遭到漠视：“惠美子紧紧盯着罗利。那只猎鹰死了。”（巴奇加卢皮，2012，p. 31）惠美子开始不再对他人寄予希望，而是由自己掌控命运。因此，“猎鹰”既象征着惠美子对自

由的向往，也是它对自由的质疑，在最后时刻则意味着向死而生、采取切实的反抗。

惠美子和坎雅的形象隐晦地交错，二者将彼此作为拓展自身既有理解的参照系。坎雅对后人类产生的厌恶感及态度转变、基因技术介入自然后的恐惧心理和尝试接纳、被某种宿命论和环境因素操控的无力感、对生命意义的追问、对安全归属的期待，这些变化性也反映在惠美子身上。巴奇加卢皮描摹出人类和后人类流动的内在体验，这一过程表现出人物的成长，这也与麦基（Robert McKee）提出的“人物弧光”相呼应。他对这一原则解释道：“最优秀的作品不但揭示人物性格真相，而且还在其讲述过程中展现人物内在本性中的弧光或变化，无论变好还是变坏。”（2014，p. 114）人物的变化与后人类形象的生成性相通。坎雅和惠美子以较为开放的姿态接受外界的影响，被动或主动地联系着具有差异性的群体。坎雅认为，其边缘的卧底身份既是她的因缘，也是环境部和贸易部之间沟通的桥梁。同理，惠美子既是非法入境的生物，也是非法进口的商品，它也串联起环境部和贸易部的利害关系。惠美子是引起政变的导火索，但政变也可能更新了人类的传统观念，因此，差异性的力量可能成为一个集体内部革新的肇因。

本文将两位女性人物的身份重构作为二者对话的共同议题，认为在后人类语境中，生命形式日趋多元化，占主导地位的靈魂观不一定能够包容异质。灵魂并非预设“属人”的，严格划分人类的灵魂和后人类的灵魂可能是一种欺骗行为。灵魂不应沦为专属于人类的话语，它可能是万物共享的，是一剂在末世情绪中安抚心灵，使人类转变伦理道德观念的良药。小说中，发达的科技也许不能完全妥善地处理人类的信仰问题，信仰问题促使人类和后人类都感受到能力和生命的有限性。因此，“有限性”，这一盏刺眼的镁光灯，将人类和后人类置于共同的舞台，使它们开启主体身份的转变历程。

三、人类与后人类的有限性反思及底层主体转型

“无常”是贯穿在作品中的观念，它散落在福生、斋迪、坎雅、惠美子身上，它反映出“变化是唯一的真理”（巴奇加卢皮，2012，p. 243）的观点。发达的生物科技既没有增强人物对未来的掌控感，也没有张扬人类主体的超凡性。相反，它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身处不确定性境遇中的人类与后人类难以把握未来。“变化”引发它们共同思考个体生命的渺小和有限性。在“变化”的视域下，人类和后人类开始反思主体的有限性，并驱动底层人物的身份转型。

基因技术的滥用导致许多动植物感染基因病毒，使它们濒临灭绝，人类在这一场“抢救”比赛中仍然败下阵来，“菩提树”形象凝聚了斋迪对周遭变化的感知。在曼谷，菩提树是灵性之树，佛陀在菩提树下悟道，它代表着曼谷人对佛陀及其教义的尊崇，菩提树是佛教信仰、曼谷的生态平衡和泰国国家园的象征。但是，在转基因象鼻虫和锈病的肆虐之下，菩提树也难逃此劫。为了适应环境，它经历了变种培育的过程。即使有变种技术让菩提树维系生命，其生命力也不足以抵御持续更新迭代的基因病虫害，菩提树的生存危机呈现了多数物种包括人类遭遇的困境。斋迪认为一棵正在腐烂的菩提树，“就像在宣示他们的失败”（巴奇加卢皮，2012，p. 16），菩提树之死不仅标志了环境部的失败，让他发出“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的感叹（同上，p. 243），也让他感到迷惘。

菩提树和妻子查雅和都被并置在“被拯救者”的范畴中，二者都被现实的“无常”范畴所涵盖，并打击了斋迪掌控全局的自信心。斋迪逐渐认识到，接纳失去不仅意味着顺应变化，也是重塑主体性的顿悟之道。一方面，作为斋迪珍视的宝贝，菩提树和查雅在某种程度上却是被动的，二者是斋迪的拯救意识的承载者，即被拯救的客体。同时，他不自觉地剥夺了查雅和菩提树自我拯救的能动性，斋

迪在无形中以英雄主义确立了强者的姿态，他曾经自恃为一个“大写的拯救者”。然而，在千变万化的曼谷环境中，基因技术、流行病虫害、整个生态环境和贸易部都成为他不可完全控制的因素，它们都撼动了斋迪作为拯救者的主体地位，且带给他重估一切价值的冲击力。

另一方面，斋迪意识到这一冲击将会引导他通往解脱。其中有两路径：一是更新对“客体”的既有看法，他开始明白，查雅和菩提树遭遇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二者有自我拯救的方式。斋迪与她们的关系不只拘泥于过去，菩提树和查雅也可以是拯救斋迪的主体。二是重塑自身的主体性，斋迪也是一个能力有限的被拯救者，与其他个体能够相互拯救。由此，斋迪经历了从“完美人类的无限性”到“人类的有限性”认知和存在方式的转型。有限的拯救能力不等于主体放弃拯救的努力，它是人类重新认识自我、过去和他者的开端。

“后佛陀”的信仰瓦解了传统信仰的至高权威，人们不再满怀希望地等待圣人帮助自己摆脱灾难，促使人们适应新的环境并尝试接纳差异。正如《等待戈多》（*En attendant Godot*, 1953）的双重内涵一样：“它既表达了与超越存在失去了联系的西方人的生存状态，也表达了摆脱这种状态的渴望。”

（王晓华，2000，p. 81）马来亚当局对华人发动了“绿头带”种族屠杀，福生的家人都被屠杀，只有他幸运地逃到曼谷。黄种难民需办理一张黄卡当作入境的身份证明，因此，他们被泰国本土蔑称为“黄卡人”，和后人类一道，黄卡人也是泰国社会的底层群体。大屠杀和颠沛流离的遭遇让福生看透了拯救的虚妄性，“数道阳光如利剑般从百叶窗的缝隙中射进来，照亮烟雾缭绕的供品——不知道是供奉给哪些神佛的。不过，这些神佛并没能拯救马来亚的华人，亦即陈福生的同胞们。”（巴奇加卢皮，2012，p. 17）

福生和惠美子的顽强求生欲形成了呼应。一方面，糟糕的生存处境为二者解构了幻想中的拯救者。“谁来拯救我”这个疑问，转化为“我该怎样自救”的求生策略。等待的无望感反而增强了他们重获新生的热望，二者都承认并勇于承受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并非是一种宿命，在不确定性中的主体依然有创造生机的权利。在求生欲的表达层面，两者达成了对话，人类与后人类遭遇的生死威胁都具有偶然性，但是这种偶然性“不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个创造的机会”（威廉姆斯、伯洛德，2003，p. 421）。与此同时，它们都无法免除社会制度、肉身性、与他者的关系、社会环境的影响，这些复杂的因素从整体上构成了人类身体和后人类身体交织在一起的语境——后人类是人类的语境，人类是后人类的语境。因此，当后人类和黄种难民等底层主体消解了拯救者的权威后，他们也可能获得创造未来的机遇。他们认识到变化的环境是命运的组成部分，只有携手相互拯救“我们”，才得以创造“我”的命运。人类和后人类共同面对着基因技术和人造物种的议题，基因技术因素可能正在改写人类对动植物的工具性认知和统治逻辑，从而引发人类和后人类重新理解自身的动物物种身份。

四、人类与后人类对人造物种的重新定位

在《发条女孩》中，人们可以在曼谷的街道边看到柴郡猫忽隐忽现、闪烁着奇异光彩的身影，科学家重新设计了它们的基因，使之成为猫科同类中的优胜者，也成为人类眼中的贪食者。柴郡猫是一个叙事元素，它被人类视为“非自然”的动物。柴郡猫被人类称为“恶魔之猫”，它被人类屠杀，它和后人类惠美子身处“同命相怜”的境遇，二者结成了人造物种的同盟关系，共同拓展了人类对混杂主体与自身物性的认知图谱。

柴郡猫之“恶”很大程度上根源于人类对基因技术的滥用，作为基因技术的试验品，柴郡猫承受了无端的骂名。柴郡猫的原型来自英国作家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出版于1865年的童话《爱丽丝漫游奇境记》(*Alice in Wonderland*)，卡罗尔在其中刻画了能够凭空消失、咧嘴一笑的柴郡猫形象。巴奇加卢皮在《发条女孩》中将这一形象复现为鲜活的生物。卡路里公司的一位高层领导为了庆祝女儿的生日，利用基因技术将柴郡猫复活，派对上的孩子们也将柴郡猫带回家当作宠物。柴郡猫和普通品种的猫交配，在二十年之后，柴郡猫遍布世界各地，普通家猫便灭绝了。过度繁殖的柴郡猫捕食大量鸟类，加之没有天敌的威胁，它们加剧了生态的失衡。这是柴郡猫诞生的前史，也是它被人类污名化的开始。它们原本是迷人神秘的形象，人类盲目地将柴郡猫带入现实，人类“造物主”没有充分考虑它们的生态影响，无力对其繁殖行为负责。为了适应环境，求得生存，柴郡猫占据了食肉目猫科的食物链顶端，成为了非自然进化的王者。柴郡猫和惠美子都是人造物种的生命形式，二者缔结同盟关系的依据在于：它们共享基因技术带来的非自然进化及其优势，二者都被人类视为“科技动物他者”(the techno other)(Hageman, 2012, p. 296)处于相同的被压迫地位。

人类对柴郡猫的认知经历了“神秘化-祛魅-复魅”三个阶段。首先，叙述者交代了柴郡猫的来源，它是一个鬼魅般的童话形象，读者对它的文学想象构成其基础性的存在方式。人们用文字塑造它，这个过程为柴郡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而在现实中，它们没有完全对应的实体。接着，卡路里公司的高层使用生物技术，把它从想象世界转移到现实。柴郡猫成为人们可以切实触摸到的动物实体，并作为被驯化的宠物。人类以技术手段实现了祛魅，它变得和普通家猫一样，是一件奇特却又令人亲近的“玩具”。柴郡猫一旦脱离人类的控制，进入了生物圈，便影响了食物链的整体运作。柴郡猫从人畜无害到生存强者，其生存状态让人类觉察到了某种威胁。由此，人类给柴郡猫贴上了“恶魔之猫”的标签。它成为破坏生态平衡的“害兽”、没有灵魂的人造生物、带来厄运的幽灵，一系列恶名又使柴郡猫复魅，它再次变得不可捉摸。为了操控柴郡猫，人类以环保的名义对它们施加暴力，而这无止境的暴力恶化了人类与柴郡猫之间的关系。这三个阶段反映出人类与柴郡猫之间关系的失衡，这一失衡现象与“柴郡猫”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关系的失衡相对应。卡罗尔·亚当斯(Carol J. Adams)在其著作《肉的性别政治：女性主义-素食主义批评理论》(*The Sexual Politics of Meat: A Feminist-Vegetarian Critical Theory*, 1990)中引入缺席指涉(the absent referent)的概念。“在索绪尔的符号学体系中，能指指向所指，所指也称为指涉。如果某个所指与其能指的关系被斩断，能指指向一个新的指涉，那么原有的所指就变了缺席指涉。”(韦清琦、李家鑫, 2019, p. 2)在卡罗尔看来，人类屠杀动物和压迫女性都遵循着共同的统治逻辑。

柴郡猫和惠美子遭受的是同一套符号学统治逻辑，人类以在场指涉固化了对它们的认知，掩盖了缺席指涉暴露的可能性，并找到了施加暴力的借口。人们谈及柴郡猫和惠美子时大多使用譬喻式的语言，这些语言中含有鄙夷的态度。当惠美子询问罗利需要多少钱可以赎回自己时，罗利对它吼道，“你就像只该死的柴郡猫”，“总是想从死尸身上咬下点儿什么来”(巴奇加卢皮, 2012, p. 230)。同时，柴郡猫又密切联系着黄种难民，贸易部官员那隆将后人类、柴郡猫、黄种难民三者并置来形容他对惠美子的印象：“好像那个发条杀手是一只柴郡猫，又或者是一个黄卡人。”(同上, pp. 397-398)在他眼中，惠美子和柴郡猫是鬼魅般的人造动物，都是外来的黄种人和外来的生物，处于这个国家最不被待见的底层。福生被泰国人识破黄卡人身份时感到自卑，他仍然装出轻松的模样，“好让对方能够将他视为一个人，而不是一只不受欢迎的柴郡猫。”(同上, p. 326)柴郡猫的在场指涉既指向人

类对动物施暴的合理性，也指向泰国本土的群体对后人类和黄种难民的排斥。基于缺席指涉话语下共同承担的暴力，惠美子和柴郡猫之间建立了“他者”的同盟关系。惠美子对柴郡猫有着不同层次的看法，这些看法同时交汇成人类认识后人类和柴郡猫的新视野。

以颂猜对柴郡猫的感性认知为例，人类能够选择以感性的方式直观万物，暂时卸下理性的镣铐。康德将感性作为最初级的认知方式，“感性正是和物的现象打交道，它是对现象的认知，因此，它是经验性的。”（汪民安，2022，p. 101）因而，感性可能提供了直观物的途径，它主要依托主体体验后获得的经验，既有认知范畴和先在知识对物的渗透也是相对较少的。从感性到知性再到理性，主体逐步将直观后的经验提炼为知识。问题在于，颂猜对人造物种已经形成了理性认知，他为何又回到了感性的认知阶段呢？这也许是颂猜的个人选择。他发觉，人类对于柴郡猫的理性认知虽然维护着自身的优越感，但是这种优越感摇摇欲坠，而人类非理性的暴力行为更让他良心不安，他保留了“人造”“动物”“柴郡猫”的概念，自觉抛弃了“恶魔之猫”“害兽”“低等非自然生物”的偏见。由此，人类可以找到自身与人造物种共享的物质属性——混杂性，从而尽量避免理性对人造物种和对人类自身的暴政，将认知暂时控制在感性-知性的限度之内，切身感受具体的生命，而非将它们抽象化为一个总体概念。

物性的凸显、人类的认知方式、人类与动物的关系三者相互塑造，这揭示了后人类时代“万物齐观”的审美特征。主体对具体之物的感性认知过程，也是学习观察万物的运动方式、摒除人类独白声音的过程。这个过程建立了万物齐一的圆融性和共生感：“人对物的审美本身就是一种人与物的生命交融，或者进一步说，人也是物”，人类对物的感知亦是感性的回归，而“工业文明和城市化使人感性零落，这就需要感性的复敏”（王坤宇，2021，p. 133）。

结语

在主体间对话关系的视域中，本文以《发条女孩》为例，认为科幻文学能够启发读者想象人类与后人类之间可能发生的故事，以心理预演的方式重新建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后人类不再是被压迫的对象，而是一股与其他人物互相塑造、互相启迪、互相成就的蓬勃生命力。后人类形象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们是人类在科幻叙事中想象的他者，在诞生之初，它们可能背负着沉重的“他者”标记，它们尚且没有实体性的存在，主要是作为一种混杂主体的隐喻。起初，作家将它们设想为人类主体性的对立面，一个不可知的黑洞。随着情节的推进，它们反叛或屈服、与人类和解或对峙，除此之外，人类与后人类之间的关系仍然有其他可能的样貌。进而，读者可以在人类与后人类的关系中动态地读解人类和后人类的主体性，窥见人类和后人类呈现各自主体性的不同方式，在关系性的视域中不断调整人类对自我、对后人类主体的理解。

Funding: This research received no external fund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Zhang Yuan ^{ID} <https://orcid.org/0009-0001-5807-0701>

References

- Bacigalupi, Paolo (2009). *The Windup Girl*. San Francisco: Night Shade.
- 保罗·巴奇加卢皮 (2012): 《发条女孩》, 梁宇晗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 [Bacigalupi, Paolo (2012): *The Windup Girl*, translated by Liang Yuhuan. Sichuan Publishing House of Science & Technology.]
- 米哈伊尔·巴赫金 (1998): 《诗学与访谈》, 钱中文主编, 白春仁, 顾亚铃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
- [Bakhtin, Michael (1998). *Poetics and Dialogues*. Qian Zhongwen (Ed.), translated by Bai Chunren, & Gu Yaling et al. Hebei Education Press.]
- 罗西·布拉伊多蒂 (2015): 《后人类》, 宋根成译。河南大学出版社。
- [Braidotti, Rosi (2015): *The Posthuman*, translated by Song Gencheng. Henan University Press.]
- 约瑟芬·多诺万 (2013):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阅读橘子”, 蒋林等译。格雷塔·戈德, 帕特里克·D·墨菲编: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理论、阐释和教学法》,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95-126。
- [Donovan, Josephine (2013). “Eco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 Reading the Orange”, translated by Jiang Lin et al. In Gaard, Greta & Murphy, Patrick D. (Eds.), *Eco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 Theory, Interpretation, Pedagogy*,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95-126.]
- Hageman, Andrew (2012). “The Challenge of Imagining Ecological Futures: Paolo Bacigalupi’s *The Windup Girl*.” *Science Fiction Studies* (02): 283-303. DOI: <https://doi.org/10.5621/sciefictstud.39.2.0283>
- 唐娜·哈拉维 (2016): 《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 陈静译。河南大学出版社。
- [Haraway, Donna (2016).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translated by Chen Jing. Henan University Press.]
- 江玉琴 (2024): “后人类主义新维度: 一种赛博格主体与主体性报告”, 《文艺理论研究》(06): 48-59。
- [Jiang Yuqin (2024). “A New Dimension of Posthumanism: A Study of Cyborg Subject and Subjectivit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06): 48-59.]
- 罗伯特·麦基 (2014): 《故事: 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 周铁东译。天津人民出版社。
- [Mckee, Robert (2014): *STORY: Substance, Structure, Style, and the Principles of Screenwriting*, translated by Zhou Tiedong. Tianj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乔·莫兰 (2023): 《跨学科: 人文学科的诞生、危机与未来》, 陈后亮, 宁艺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 [Moran, Joe (2023). *Interdisciplinarity*, translated by Chen Houliang & Ning Yiya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 王坤宇 (2021): “超人移情、伴侣物种与感性复敏: 后人类审美的三个层次”, 《南京社会科学》(03): 128-135。
- [Wang Kunyu (2021). “Superhuman Empathy, Companion Species, and Sensitivity Regaining: On the Three Levels of Posthuman Aesthetic.” *Nanjing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03): 128-135. DOI: <https://doi.org/10.15937/j.cnki.issn1001-8263.2021.03.015>]
- 汪民安 (2022): 《情动、物质与当代性》。山东人民出版社。
- [Wang Min’an (2022). *Affect, Matter, and Contemporaneity*. Shando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王晓华 (2000): “后上帝时代的等待者——对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的文本分析”,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05): 81-86。
- [Wang Xiaohua (2000). “An Awaiter in Post-god Era: A Textual Analysis of an Absurdist Drama *Waiting for Godot*.” *Journal of Shenzhen University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05): 81-86. DOI: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260X.2000.05.013>]

韦清琦、李家奎（2019）：《生态女性主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Wei Qingqi, Li Jialuan (2019). *Ecofeminism*.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西蒙·威廉姆斯、吉廉·伯洛德（2003）：“身体的“控制”——身体技术、相互肉身性和社会行为的呈现”，朱虹译。汪民安、陈永国编：《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吉林人民出版社：399-432。

[Williams, Simon & Bendelow, Gillian (2003). “Bodily ‘Control’: Body Techniques, Inter-corporeality and the Embodiment of Social Act”, translated by Zhu Hong. In Wang Min’an & Chen Yongguo (Eds.), *Postbodies: Culture, Power, and Biopolities*, Jilin People’s Press: 399-432.]

姚富瑞（2022）：“后人文主义身份想象与媒介技术的文学表征”，《西北民族大学学报》（04）：166-173。

[Yao Furui (2022). “Posthumanism Identity Imagination and Literary Representation of Media Technology.” *Northwest Minzu University* (04): 166-173. DOI: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5140.2022.04.019>]